



## 序

余治殷周古文，其目的本在研究中國之古代社會，年來已累有所敘錄；其關於文字攷釋之事者時亦有所弋獲焉。曩歲已成“甲骨文釋”一書，專輯攷釋甲骨文字者以為一編矣；今復就平時于金文中所累有心得者，費一閱月之力，成文凡十有六篇，以集成此錄。

此錄所論諸器，除末附四篇外，其制作時代大抵均可徵攷；故編次即以年代為順，第一卷所錄者迺殷末周初之古文，第二卷之前六篇迺春秋時代之文獻也。是以二卷之分實自成段落，讀者于此不僅可以徵文，亦且可以考史矣。

古器銘文之確足以徵年者，此外尚屬多有；如成王時代之孟鼎，昭王時代之宗周鐘，穆王時代之遹盤，厲王時代之靜盤，降至春秋則如齊侯鑄鐘之作于齊靈公末年，龜公牼鐘乃卒于魯襄公十有七年之“邾子牼”之器，邾王義楚鑄之。

鄒王義楚卽左氏昭六年傳之“徐儀楚”，又如陳侯午鑄陳侯因  
育鑄等，皆于史籍有徵。或因前人已論之甚詳，或因無多發明  
故此不再論列。然此等于年有徵之器物，余以為其圖象與  
銘文當專輯為一書，以為攷定古器之標準。蓋由原物之器  
制与花紋，由銘文之體例与字跡，可以作為測定未知年者  
之尺度也。例如彼膾炙人口之毛公鼎，前人均以<sup>為</sup>周初之器。  
余初以其銘文如尚書“文侯之命”，不類周初之文，頗致疑惑。  
近得見其圖象，其足乃甚低而作獸蹄之形，此決非周初所  
有之器制也。凡周初之鼎与殷制相同，足均高而作圓柱形，  
上大下小；其低而作獸蹄形者於春秋初年之器多見之。  
準此二者余敢斷言毛公鼎者必係宣平時代之物也。僅此  
一例，可知器制与花紋于鑒定之事甚關重要，其標準之  
設置与系統之追求之不可或緩；然目前為此事者似尚無  
人，而余則無此便宜，且無此餘裕。

余于古器物實少接觸之機會，所得接觸者僅少數之

圖象與銘文而已。然關於銘文，則凡已見著錄者，自趙宋以至近代，大抵均已寫目。目驗既多，則心屏自啓。銘之真贗，大率觸目可辨也。

茲編所據之資料，率為已著錄之器，其未經著錄者亦有一二事焉。資料之源泉以羅振玉氏所編之“殷文存”與鄒安氏所編之“周金文存”為主。後書雖真贗雜糅，然所收之器特多，對於善用者固亦一豐富之資源也。處理資料之方法，則以得力于王國維氏之著書者為最多；其“金文著錄表”，與“說文諺聲譜”二書，余於述作時實未嘗須臾離于左右也。其它各種曾經參攷或有所徵引之書，均詳出于本文腳注中，不復贅列。

一九三〇年七月廿九日 沐若。

## 追記四鼎

大小盨二器，舊依舊說以為成王時器，今案此說不確。小盨第十六行（據古一行分二，故在三十一行）文為“牛牲周王口王成王”，舊讀為補。近時吳其昌認周王即文王，下闕一字為武王。大盨乃康王時器。其說是也。余謂大盨亦嘗作康王之世。大盨作“廿又三祀”，小盨作於“廿又五祀”，相隔二年。大盨銘云：“不顯文王受天有大命，在珷王嗣康王作邦，闢厥匱嗣有四方，晚正厥民。在寧（子）御事，獻酒無敢醻，有祭蒸祀無敢饗，敬天翼歸于，護保先王，口有四方。”細案此篇文義，所謂“先王”當指成王而言，如依舊說“先王”為兼括文武二王，則“口有四方”與上“嗣有四方”句犯複，文意畫蛇，故知舊說非是。又銘中稱南公為盨之祖，南公嘗即南宮括，即不然也。亦嘗為文武時之功臣。其孫之盨自以告於康王《世猶宜。

\*

近得見馬衡《新鄭古物出土調查記》(東方雜誌第二十一卷紀念號)、新鄭出土古器圖志及新鄭古器舊見記序言，於墓論所鄭侯一文有異有補充。

#### [四] 調查記得始

- 一、發現之時日：民國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。
- 二、發現之地點：新鄭縣城內東南隅邑中李銳宅旁園圃中。
- 三、發現之始末：李銳鑿井為灌園之用，鑿地深至三丈，發見鼎、甗等數器。……其後劃定範圍——南北長三丈五尺，東西寬四丈五尺——層層挖掘，深至三丈，而所有古器物遂完全呈露矣。”

[四] 古器圖志後附有土塚中器次圖一。中央的橢圓形之墓穴，中有殘骨灰三司。調查記亦云“墓穴：橢圓形，深三丈，朱砂底，中有殘骨灰三（首在此，足在南），殘玉三”。器物陳列於

墓穴之周围亦呈椭圆形，而北方西留有空隙，度系甬道。南通之南（即墓穴之正西）立四方壺，南二北二，南二器之东南有二鳥形之物，案即調查記所謂“鳥二，疑為器飾”者（附圖五十八），亦即或稱為“鶴形儀飾二”（發見記附錄第一葉），其後羅振玉定為“壺蓋飾”者（發見記“古物名稱”第十六葉），後所修復之蓮蓋方壺上之鶴形也。蓮蓋方壺得以修復乃羅氏考證之結果，甚為未惠。

王子嬰次虎在甬道之北，亦在墓穴之北而稍西偏。舊稱“獸面人首小銅像”或“人首獸面形”，羅振玉改稱為“豐侯”（“古物名稱”第十五葉），閻百岳本之而名為“殘豐”者，在墓穴之東北隅。此二器同在一層，且同在一端，可證全說。因柱狀虛墻以区分之，其所以稍偏隅絕乎，當系修擾時為人夫所亂，且圍牆亦有未精也。

此外大鐘在墓穴之最南，尚禮經“薄南陳”之說合。又調查記云“腐瓦鼎在南面（依圖应在東面），最先出；器之內外有貝數百枚”。發現記中亦言得“貝貨三百十七”（附錄第二葉），其古物名稱中亦有

周貨，羅振玉分析為真貝或珧圓二種。據此則周貨於春秋初年猶見使用，此為社會經濟上重要之史料。

(三) 發現記附錄第十一葉“齊觀古物考之谈话”第十一則，古物發現始主人李銳云“古物在地中，陳列參差，皆云窖廁空器。當時余嘗觀本匣一，其中滿藏玉器，又枯骨三具，或為殉葬女之骨，皆盡為工人鋤碎。”此所謂枯骨三具，頗是為余說鄭子儀與二子同葬之實證。惟谈话過簡，記錄該話之文字亦甚模糊，不知此三具枯骨是否同在一匣，是否同在橢圓形之墓穴內，惟再由得其真相也。又本匣而未朽化者亦屬可異。

\*

毛公鼎既已由余改定，確系宣王時代之物；其篆紋形式而厲王末年之陽文从鼎全同，余別有文以詳論之。余於此外，於共懿姬玉的器物有郵作，已成文十餘篇，日後寄轉為一冊，補牛書之閣。

陳敬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廿六日記。

# 目 錄

## I.

一、殷彝中圜形文字之一解

二、戊辰彝 放釋

三、大豐設韵讀

四、令彝令盤与其它諸器物之綜合研究

  I. 令彝釋文

  II. 令盤釋文

  III. 明保考

  IV. 餘論

五、公伐邾鐘之鑒別与其時代

六、魯侯角釋文



# 殷彝中國形文字之一解

殷彝銘中有無數圖形文字，前人往往以臆考說，多不得其解；今人又往往視為“文字畫”，而亦以臆考之說。

例如一文，自宋以來大抵均釋為“褓子孫”。近人王國維以為：“乃一字，象大人抱子置諸几間之形”，此近是矣；然於子孫觀念未能除盡，繼進而為之說解曰：“子者尸也，《曲禮》曰：‘君子抱孫不抱子；此言孫可以為王者尸，子不可為父尸。……古之為尸者其年極幼，故作大人抱子之形。其上或兩旁之非別周禮所謂左右玉几也。’”此絕以固制說殷文，案於資料



\* 此字當於英文之 Pictography，中國學者仍用此字者實即是沈兼士氏，沈有“从古器物識上推尋六書以前之文字畫”一文（見莫亞考古學會所出“考古學論叢”第一冊。） \*\* “觀堂集林”卷三，“說俎下”。

問題已有可商。蓋殷代社會猶存母系中心之遺習<sup>\*</sup>，小孩觀念甚薄弱。殷素未見孫字，卜辭已著孫者已六七千片，而孫字僅一見<sup>\*\*</sup>。故大人抱子不必即是尸象，殷人用尸與否尤需先得考查。即退一步說，承認大人所抱者為尸，則此銘文必當施諸祭器，然如“商婦肅瓦”，“婦鬱肅瓦”，“父丁鬲”等<sup>\*\*\*</sup>均有此銘。肅瓦乃蒸煮之器，非祭器也。僅此已足為王說之致命傷矣。

又例如  自宋以來亦均釋為“子孫”，近人容庚則以為“象陳牲體于尸下而祭”，同以尸祭為說，蓋本於王氏之‘釋姐’。然此說之不足信與王說同。人形下一物分明龜鼈之象，何得誤為“牲體”？且陳牲而祭矣，則必施諸祭

\* 參看拙著：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”第三篇“卜辭中之古代社會”。

\*\* 羅振玉編：“殷虛書契後編”卷下（以下另稱殷後上或下）第十四葉第七片。  
本商承祚說，見所著：“殷虛文字類編”第十二卷第十二葉。

\*\*\* 三器具見羅振玉編“殷文存”。

• “寶蓋樓彝器圖錄”第九葉，“周獻侯鼎”注。

器，然有“子孫父癸盤”，\* 又“西清古鑑”有“周子孫匜”，\*\* 匝乃盥洗之器，非祭器也。有<sup>子孫</sup>“婦姑獻”，<sup>子孫</sup>獻亦非祭器也。故審說與王說同一不能成立。

且王審二氏之說均立於“文字<sup>書</sup>之觀點，所謂“文字書”者乃文字形成之前階段，即野蠻或原始民族在未有文字將有文字之時所用<sup>以</sup>圖為<sup>以</sup>意思表現之符徵。此種未成形之書語，在現存未開化民族，如北極附近之埃克西摩人、美洲之印第安人，於今均猶見使用。然殷商之圓形文字若作為“文字書”解時，有一根本之困難：即殷代文化已遠，超過此階段，而已有行動完成之文字系統。且如所謂“叔子孫”及“子孫”二例，據余見，於周彝中亦猶見使用。例如旅鼎，其銘曰：“唯八月初吉，辰在乙卯，公錫旅饌。旅用作文父己<sup>子</sup>寶尊彝”，銘末即繕以<sup>子</sup>。此器用“初吉”，乃

\* 沈元：“續古齋鐘鼎彝器鍛識”卷二，第42頁。 \*\* “古鑑”卷世二，第十六頁。 \* “摩古”二之一，第13頁。

周制<sup>\*</sup>，故器必作於周代無疑。<sup>\*\*</sup>又例如周獻侯鼎<sup>\*</sup>，其銘云：“唯成王大茶，在宗周，商（嘗）獻疾觸見。用作丁侯尊彝”；銘末即續以<sup>中</sup>。此乃成王時器，則銘文已有明文。故即此二器，尤足使“文字畫”之說整個不能成立。蓋二器銘文所表示者乃當時文化已有比較高度之發展，已有一定之曆法，一定之典禮，一定之文字體例，而在此時尚有所謂“文字畫”之使用，此絕端不合理。知此則知根據“文字畫”之觀念所立諸說之必為臆說，可不待詳而自明矣。

字作畫解既不能成立，則當返歸於字以求之。余謂些等圖形文字乃古代國族之名號，蓋所謂“圖騰”之子遺或轉變也。此於彝銘本身可尋出種々之證據，今請先言窩。

\* 王國維說，見“觀堂集林”卷一，“生霸死霸考”。

\*\* 羅振玉收入“殷文存”中，蓋因有“文父乙”字樣，誤以為殷彝。然周初亦沿殷習以生日為名，如遹乃“穆王”時器，亦稱“文孝父乙”。

\* “竈匱樓”（已見前）<sup>④</sup>原始民族多以動物為其族徽，號曰 Totem，“圖騰”二字乃嚴復所對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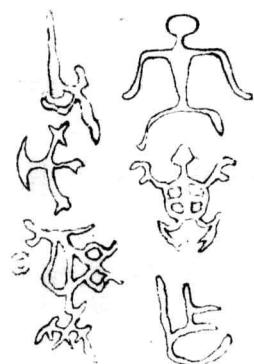


三晉為國族民學帛皆有徵證。

其一為“甲寅父癸角”（圖第一），又其一為“父戊方鼎”（圖第二）。



（圖第一）



（圖第二）

斯云“匱作父戊彝”，以彝銘通例“某甲作某乙器”例之，可知此圆形文字當係作器者之名。

角云“甲寅子錫匱鼓貝，用作父癸尊彝”，則知此圆形文字當為“匱”之族號。

角銘乃彝銘文例最規整之一例，即“某時·某人因某事·為某作器”。簡之則如鼎銘。更簡則僅標一圓形文字，於其下附以父戊父癸等名。其為自身作器者，則除一圓形文字

外，並父戊文癸等名而未無之。案此乃原始文字省去動詞之通例也。文字之發生必先有名詞而後有動詞，因而言文之結構亦必先有主語而後有賓語。此觀之小兒言語可得其明證。準此則單在一圓形文字者僅作器者之自標■其徵文識而已。此意猶今人於所有物或所造物之上蓋■章或簽名，本乃極尋常之事，然一落於古器，則因其器之奇古，字之奇古，又益之以歷來傳說之敬宗追遠貽據翼子之先入見，於是乃自立臆說，使歧之中又有歧焉，此誠所謂大惑不解者矣。



其次如，此亦有種々證據足知其為國族之號。如所謂“折子孫作父山彝”卣，\* “折子孫作父辛彝”卣\*\* 与上父戊方鼎例全同。此外如“文父辛尊”(周第三)，其銘曰：“子光(既)

~~~~~

\* 吳大澂：“塞齋集古錄”，第十八冊第十六葉。(殷文存中亦有折片。)

\*\* 同上：第二冊第十八葉。

† 端方：“陶齋吉金錄”第一冊第四十五葉有形。

口子<sup>鼎</sup>啓見，用作文父辛尊彝”。又如敘彝（圖第四），銘曰<sup>鼎</sup>敘作祖癸寶彝。此作器者之“啓”與“敘”均係以此圖形文字為族氏者也。



(圖第三)



(圖第四)

且此民族之名號尤有種異形。有首作<sup>人</sup>者<sup>\*</sup>，有首作<sup>獮</sup>者<sup>\*\*</sup>，有首作<sup>橫書</sup><sup>獮</sup>者<sup>\*\*\*</sup>，亦有首作<sup>人</sup>者<sup>\*\*\*\*</sup>，更有全首其“二凡”而作<sup>人</sup>若<sup>獮</sup>者<sup>\*\*\*\*\*</sup>。

~~~~~

\* 父丁鬲及父癸爵（見《殷文存》）

\*\* 擬古一之二·角彝（器蓋同文）

\*\*\* 韶銘，陽識（《殷文存》下卷28葉）

\*\*\*\* 姚己爵（《殷文存》）及齊婦鬲（《叢書》）